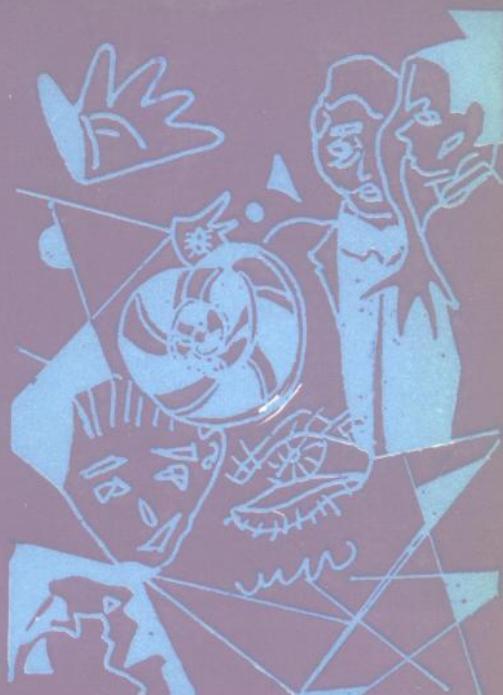


东亚现代化研究丛书

韩国为什么成功

——朴正熙政权与韩国现代化

尹保云著



文津出版社

韩 国 为 什 么 成 功?

——朴正熙政权与韩国现代化

尹保云 著

文 津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205号

韩国为什么成功?

HANGUO WEISHENMO CHENGGONG

尹保云 著

*

文津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农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375印张 186千字

1993年7月第1版 1993年7月第1次印刷

*

印数: 1—5000

ISBN 7-80554-175-2/F·20

定价: 6.00元

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近半个世纪中，东亚是世界各地区中变化最大的地区。东亚地区的变化最突出地表现在它的经济增长速度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也远远超过西方国家曾经创造的纪录。高速增长带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的巨大变化，使东亚地区成为战后世界工业化—现代化高潮中的佼佼者。

从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现代化进程，迄今为止一共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浪潮。从18世纪后期英国工业革命开端，到19世纪中叶，出现了世界工业化—现代化的第一次大浪潮，中心区域在西欧。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出现了世界工业化—现代化的第二次大浪潮，中心区域从西欧扩大到东欧与北美，拉美地区也受到很大影响；同时越过欧陆传到东亚，在日本取得独一无二的成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年代到目前，出现工业化—现代化的第三次大浪潮，这次大浪潮扩散到亚、非、拉广大地区，但中心在东亚地区。

东亚由中国与日本两个大国及若干东亚边缘区的小国和地区所组成。到二次世界大战时为止，除日本以外，这整个地区都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和经济欠发达状态。除日本以外，东亚各国都是在二次大战后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才开始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但在短短的四十年中，整个东亚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上，取得了高速度发展的惊人成就。中国从被讥为“东亚病夫”的农业国一跃而为强大的新兴工业—农业大国。东亚原来的唯一的工业国日本在战争中一败涂地，但战后的重建运动实质上

是进行了第二次现代化，一跃而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大国。东亚的边缘国和地区都高速推行工业化，其中最突出的台湾省、韩国、新加坡、香港，被称为“四小龙”，在最近二十年中已变成全世界瞩目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NICs, New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and Areas）。近年来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东盟国家的经济增长势头也看好，甚至越南也在发生明显的重要变化。从长远来看，东亚的新兴的经济—文化区的前景正引起举世瞩目。

现代工业文明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文明。现代化的核心和基础是工业化，工业化的重要经济特征是产业结构的改变与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又称之为“现代经济增长”。这是从人类社会大生产形态的改变中来的，因而标志着一个特殊的经济时代的到来。最初，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这种经济增长只在很小的英国某些地方出现。当时人均国民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已是一个历史性的创新。到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在西方先进工业国中这一增长率达到1—2%，即提高约一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增长率又翻一番，达到3—5%，被称之为“经济奇迹”。但真正的经济奇迹出现在东亚地区。这里许多国家和地区在战后工业化进程中把经济增长的年平均增长率提高到7—8%，甚至更高，一般都高出西方发达国家年平均增长率一倍以上。这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出现的全新势头。

东亚的重新崛起不仅为第三世界国家扬眉吐气，也使西方国家感到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都面临着东亚的新的挑战。东亚的新经验表明，不论是西方自由派的现代化理论还是激进派的依附理论都远远落后于实践。各国关心发展问题的专家、政治家以及企业界人士，都密切地关注东亚的发展势头，从发展战略、模式、体制、文化传统、历史条件等各方面研究东亚社会创造的现代化“奇迹”。这是值得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加以

重视的。当前，我国正努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握机遇，积极投入新的世界发展大潮之中。在这一形势下，深入研究我们近邻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各种新经验，是一个迫切的任务，这不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我们都具有重大意义。

《东亚现代化研究丛书》是一个新的研究园地。耕耘者大多是中青年学者，他们试图用新的理论，从经济、政治或社会变革的多角度，去探讨东亚各国各地区发展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动向。这种钻研精神是值得提倡的。我相信，这套丛书能给关心现代化的广大读者带来新的知识、新的思考；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必将通过探索、学习与借鉴而不断提高和前进。

罗 荣 渠

1993年2月28日于北京大学
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东亚现代化研究丛书编委会

顾问:

费孝通 厉以宁 赵宝煦 罗荣渠
徐雅民 薛汉伟 阎志民

主编:

杨元明 麦光博

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文章 尹保云 孙代尧 杨元明
张旅平 姜南扬

导　　言

在朝鲜人的传统观念中，他们的土地上站着五个动物：东边是一条蓝色的龙，南边是一只红色的凤凰，西边是一只白色的虎，北边是一只蛇和一只龟。这五个动物被画在王室墓穴的四壁和神圣建筑物上。一位韩国历史学家指出，这种动物崇拜表明朝鲜人民是“朝气、勇敢和开朗的民族”。如今，南方的“凤凰”起飞了，韩国（即“南朝鲜”）在短短三十年时间内取得的成就，引起世界各国研究发展问题的专家们以及政治家们的极大关注，证实了这位历史学家的话。

然而，这个勤劳勇敢的民族，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却历经坎坷波折。1876年，日本强加的《江华条约》打开了素有“隐居小王朝”之称的朝鲜的大门。从此，朝鲜半岛就暴露在帝国主义的刀俎之上任凭宰割。1894年从这里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1904年在这里爆发了日俄战争；1910年，日本吞并了朝鲜；1945年独立后，它又被苏联和美国以38°线为界分为南北两个部分；1950年又爆发了朝鲜历史上最大、最残酷的战争。朝鲜半岛的近现代史是一部屈辱史、血泪史。从1953年朝鲜停战到60年代初的韩国，人们目睹的也只是饥饿、贫困和大学生游行，看不到什么发展的希望。

韩国经济起飞是在朴正熙政变上台以后开始的。从1962年到1980年，国民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5%，人均产值由83美元增加到1553美元（按1980年价格计算）。这一长时期的高速增长，使韩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步入“新兴工业

①Han Woo-Kein, *The History of Korea*, Seoul, 1970, P.65.

国”的行列，造船、汽车、电子、远程导弹等工业产品打入世界市场并显示出惊人的竞争力。1980年，由于受到世界经济萧条的冲击，韩国经济出现短暂的停滞。但在全斗焕上台后经过一些调整、改革，很快又恢复了增长速度。1988年，韩国在迟发展国家中第一个举办奥运会，当时被普遍地认为是历来管理最好的一次奥运会。1991年，韩国国民总产值跃居“东亚四小龙”之首，人均GNP超过6000美元。韩国被誉为“第二个日本”。

韩国虽然在朴正熙以后经历了新的发展，但对韩国现代化的研究应主要是对朴正熙时期（1961年—1979年）的研究。正如国际学术界所共认：朴正熙政府创立了类似日本统制经济的“指导的资本主义”模式，奠定了韩国经济的一切基础。研究这一阶段，搞清韩国经济是怎样从看不到希望到突然起飞的，对目前尚在无效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徘徊不前的贫穷国家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国际学术界对韩国工业化的研究兴起于70年代末，因为此时韩国经济已光景丕变。可以把国际学术界对韩国经济奇迹原因的解释概括为以下几类：（一）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解释，强调朴正熙上台后的“自由化”和“开放”政策的重要；（二）国家干预主义的解释，强调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指出朴正熙上台后，政府对经济干预加强的事实；①（三）强调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的互相补充作用，这种观点是对前两种观点的调合；有的学者还指出政府干预同市场力的“混合”是特殊阶段的产物；②（四）多因素的解释，强调多因素的相互作用。比如哈佛大学一批学者1980年出版的《韩国的经济和社会现代化》，除了强调朴正熙政府

①参看：G.White, et al. (eds), *Developmental States in East Asia, IDS*, Brighton, 1988.该书对两派争论作了较全面的介绍。

②典型的例子是M.Shahid Alam, *Government and Market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New York, 1987.

约干预作用外，还归纳了六大因素：（1）一种可能是来源于儒教传统的工作伦理，它同西欧的新教伦理相应；（2）日本人留下的遗产，包括技术和管理方法；（3）由于独立、南北分裂、社会混合、战争以及侨民回流等所造成 的社会流动和传统结构的摧毁；（4）文化同质；（5）外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6）一个迅速扩张的教育系统。①

本书的主要任务是探讨朴正熙政权的形成与韩国经济发展的关系。韩国的经济起飞是在朴正熙军事集团政变上台之后才发生的，它的时序是“先政治变化、后经济发展”。在影响韩国经济发展的多种因素中，政治变化的因素最为重要。因此，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探索朴正熙政权形成的历史背景、特征，以及这个政权所带来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秩序的变化，从而为韩国的“经济奇迹”提出一个侧面的解释。

韩国在50年代李承晚统治下的经济重建很少建树。到1960年，从当时的经济条件看，没有任何迹象说明韩国要进入经济起飞。朴正熙1961年5月16日政变上台后，1963年韩国便进入持续的高速增长，这个时间顺序把朴正熙政权突出到异常重要的位置。众所周知，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军人政权可谓多如牛毛，但多数军人政权上台只能提供政治稳定，像朴正熙政权这样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的却是少有。那么，朴正熙政权有什么不同于李承晚政权以及其他军人政权的特征？这些特征是怎样形成的？它改变了什么、开创了什么、又对韩国经济产生了什么影响？笔者认为，对这样一些问题作一系统的考察，弄清政治权力作用于经济运行方式、效果的变化的线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①Edward S.Mason,Nahn Je Kim,Dwight H.Perkins,Kwang Suk Kim,
Daid C.Cole,The Economic and Social Modernization of the Repu
-blic of Korea Haward Uni.,1980,pp.28—29.

和现实意义。

朝鲜半岛的封建社会，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是比中国还典范的儒教社会。它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不仅与西欧不同，与日本也有重要不同。18世纪中叶英国革命以降，伴随着工业主义的传播，无论是哪个地区哪个国家，原先那种自发自主的历史进程和秩序被打乱了，世界历史发展呈现出更加明显的相互影响和共同发展的大趋势。工业化的目标是一致的、现代性的挑战是广泛的，而各国通向现代化的模式和道路却千差万别，因为各国的历史传统、经济结构、政治制度、文化背景、地理环境等都各不相同。因此，客观地、具体地、历史地描述韩国的发展历程，探讨一个儒教传统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是本书研究的指导思想。

由于要探索政权变化和制度变化影响经济发展的轨迹，所以本书思索的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时间跨度包括四个主要的历史阶段：（1）朝鲜李朝时期（1392—1910年）；（2）日本殖民统治时期（1910—1945年）；（3）李承晚时期（1945—1960年）；（4）朴正熙时期（1961—1979年）。不考察历史传统，就不能理解现代变迁。比如“国家干预”，所谓“干预”（intervention）也就是插手、介入之意。在西欧，国家干预在重商主义时期表现突出，而在东亚国家，政府组织经济生活却是古已有之。朝鲜李朝时期，中央政府干预经济十分广泛。不仔细考察干预的方式和目的的历史变化过程，仅仅停留在干预好还是不干预好的争论上，就难以理解韩国朴正熙“指导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

总之，本书的特点是从儒教传统的集权官僚政治的变化的角度来探讨韩国经济成功的原因。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都是受多种内外因素的影响，不能单纯地从某一个方面来解释东亚经济奇迹。因此，本书的最高目的是提出一些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而不是要达到某种最终结论。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历史遗产 (1)	
第一节 典型的儒教国家.....	(1)
第二节 日治时期的殖民开发政策与殖民地 依附发展.....	(19)
第二章 1961年前的韩国 (31)	
第一节 从独立到南北分裂.....	(31)
第二节 旧李朝政治传统的延续（李承晚政权）.....	(38)
第三节 美国的经济援助与战后经济重建.....	(46)
第四节 “民主政治”的失败（张勉政权）	(53)
第三章 朴正熙政权的形成及特征 (64)	
第一节 军事集团的背景.....	(64)
第二节 “经济发展第一”的方针.....	(70)
第三节 专制的发展道路.....	(85)
第四章 政治体系的转向 (101)	
第一节 国家机构的变化.....	(101)
第二节 朝外向型政治经济的转变.....	(111)
第三节 反腐败斗争和“庶政刷新”运动.....	(122)

第五章 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133)
第一节 经济计划的制定和推行	(133)
第二节 分配和教育	(155)
第三节 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170)
第四节 农业政策的变化及“新村运动”	(193)
第六章 结语：韩国道路与东亚经验	(210)
后记	(221)

第一章 历史遗产

第一节 典型的儒教国家

朝鲜的封建社会同西欧的封建社会有重要的不同。西欧是多层次的等级封建结构，教权与世俗王权的分权结构，封建采邑、自治城市以及小国林立的多元结构。朝鲜的封建社会则不具备这些特征。

在中国的影响下，朝鲜半岛早在李朝之前1200多年，就已经是中央集权制社会。高丽王朝（公元918—1392年）后期，朝鲜具有一些多元社会的因素，比如佛教和儒教并立，采邑大土地贵族和军事豪强势力强大而制约了中央政权。李朝开国国王即太祖李成桂是在高丽王朝末期平倭寇起家的军事豪强。他在公元1392年篡权而建立起李氏朝廷之后，吸取了高丽王朝的教训，重新建立中央集权制，极力防止分权和地方势力上升的趋向。他加冕的第三天，司宪府提出了李朝新政权的十条原则；两个月后又颁布了二十条规定。这些原则和规定，可以归纳为紧密联系的两点：一是尊儒排佛；二是加强中央政府对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统制。从太祖采取这些措施到世宗（1418—1450年）设立“集贤殿”，指定著名儒生研究中国明朝的政治法律制度，编纂出六卷《正典》，再到成宗（1469—1494年）登基的第二年推出《经国大典》，是朝鲜政治制度“儒家化”的过程，也即是高度中央集权制形成的过程。不到一百年时间，朝鲜成了“比中国还完善的儒

教国家”。^①

李朝开国国王利用儒生和小土地贵族的势力，削弱了大土地贵族和僧侣集团的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在当时起到一定的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朝鲜半岛在14、15世纪曾一度出现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但是，这种儒教社会制度却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保守性，是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极大障碍。

(一) 集权官僚政治结构

李朝遵循儒教经典，模仿中国的集权官僚制而建立的政治制度，被马克斯·韦伯称之为“家产制政体”(patrimonial regime)。韦伯在研究中国时认为，在这种社会里，父亲在家庭中拥有绝对权力的原则被推广到国家的权力结构中，君主是最高家长，把全部土地和人民都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一代一代传给子孙。这种制度的产生有两种原因：一是传统的家天下观念；二是科举考试和文官制度。儒教的“忠”、“孝”观念，也帮助了这种统治结构，使人民支持君主家天下的做法。^②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朝鲜，君主并非总是具备韦伯所说的那种绝对权力。

李朝中央最高权力机构是议政府。它同高丽王朝的类似机构都评议使司的重要区别是人员减少。议政府中有首相（领议政）、左相（左议政）、右相（右议政）三个大臣，他们形成互相制约的格局，分别直接对国王负责；其次为执行政务的机关即六曹：吏曹、户曹、礼曹、兵曹、刑曹、工曹，各曹判书都有直接呈奏国王的权力。此外还有承政院，负责出纳王命；三司（司

^①Donald Stone Macdonald, *The Koreas, Contemporary Politics and Society*, Boulder and London, 1988, P.32.

^②Max Weber, *Religion of China*, New York, 1951, PP.32—42.

谏院、司宪府、弘文馆)等。这些机构互相牵制，构成以国王为核心的权力制衡体系。

地方官相的设置为：道设监司(观察使)、州设牧使、府设府使、郡设郡守、县设县监。为了维护一君万民的中央集权体制，李朝建立了两种防止地方势力兴起的制度。一种是地方官相避制，即不能在本地做官；另一种是地方官任期制，即地方官必须有一定的任期限制。目的是防止官员同地方的两班勾结，形成尾大不调的局面。基层组织叫乡厅，由地方的两班即“乡班”承当。^①

李朝社会分七个阶层：两班、乡班、土班、中人、庶孽、常民、贱人。政府有严密组织的警察系统监视公民的活动。公民胸前挂着号牌，上边写着自己的姓名、年龄、出身和住址，警察可以随时翻看行人的号牌。

在这种一层压一层的金字塔式的政治结构中，国王位于顶端。表面看来是国家的权力集中于国王一身，实际上是集中于中央权力寡头。国家的权力高度集中在京城(汉城)，以国王为核心在不断的权力斗争中形成相互限制的权力制衡，是这种政体的一大特征。国王的权力受到文武重臣以及王亲国戚的制约。文武功臣、太后、贵妃、大院君等中央一级的贵族、官僚，在不断的权力争夺中形成复杂的互相制约、互相限制、共和共存的中央权力制衡机制或寡头政治。所以，亨德森在他的名著《朝鲜：旋涡中的政治》中把这种权力结构称为“寡头集权官僚制”。^②在权

① “两班”，指文武官僚阶级。文官即“文班”属于东班，住在汉城王宫东边；武官即“武班”属于西班，住在西边。两班在李朝之前就有，其历史十分复杂。李朝开国后，逐渐走上科举考试升为两班的轨道。“乡班”即从京城衰落到地方的两班。

② Henderson, Gregory, Korea: The Politics of The Vortex,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力寡头共和共存的体系中，国王的权力或者被削弱、或者被滥用、甚至国王有可能成为傀儡。帕拉斯的研究指出，李朝27个国王中没有一个政治强人，连两个开国君主都不是“真正卡里斯玛式的”。这种寡头集权制的优点是为政治稳定和持续提供了保证，李朝维持了近500年。这种体制的缺点是很难作制度上的变革。由于改革要破坏旧的利益均衡，所以每走一步就充满血腥的权力斗争，即使面临西方冲击、国难当头时也是如此。

李朝政治制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国家官僚即两班成为寄生的利益集团。

李朝两班的统治，主要是文班的统治。李朝开国君主是军事起家，所以特别注意防止军队的势力。武职官僚的地位很低。在建国之初的1410年，国家机构中4820个官员中，文官只有820个，但此时文官已占绝对的统治地位。武人不许过问政治，连征兵工作也由文官负责。李朝只留少量的军队，目的是对付内部人民的反抗，而不是抵御外来侵略。为了确保主权以谋求对外安全之道，李成桂屈居于中国明朝的朱元璋之下，以后李朝就对明朝和清朝称臣，采取事大主义。并且，由于重文轻武的原因，科举考试主要是文科考试。科举考试分三类：文科、武科、杂科。杂科考试选拔外语、医生、天文和法律方面的人才，通过者可充当官僚机构的职员。这一阶层的人称为“常民”，基本是一个世袭的阶层。通过文科和武科考试者，便进入两班阶级。由于武班地位低，武科考试也越来越随便，到李朝后期，连“贱民”阶层的人也能考中。两班的子弟都竞争文科考试，三岁便开始学写汉字、读四书五经。

①James B.Palas,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the Yi Dynasty",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Korea, Dae-Sook Suh and Chae-Jin Lee (eds), 1976, P.6.